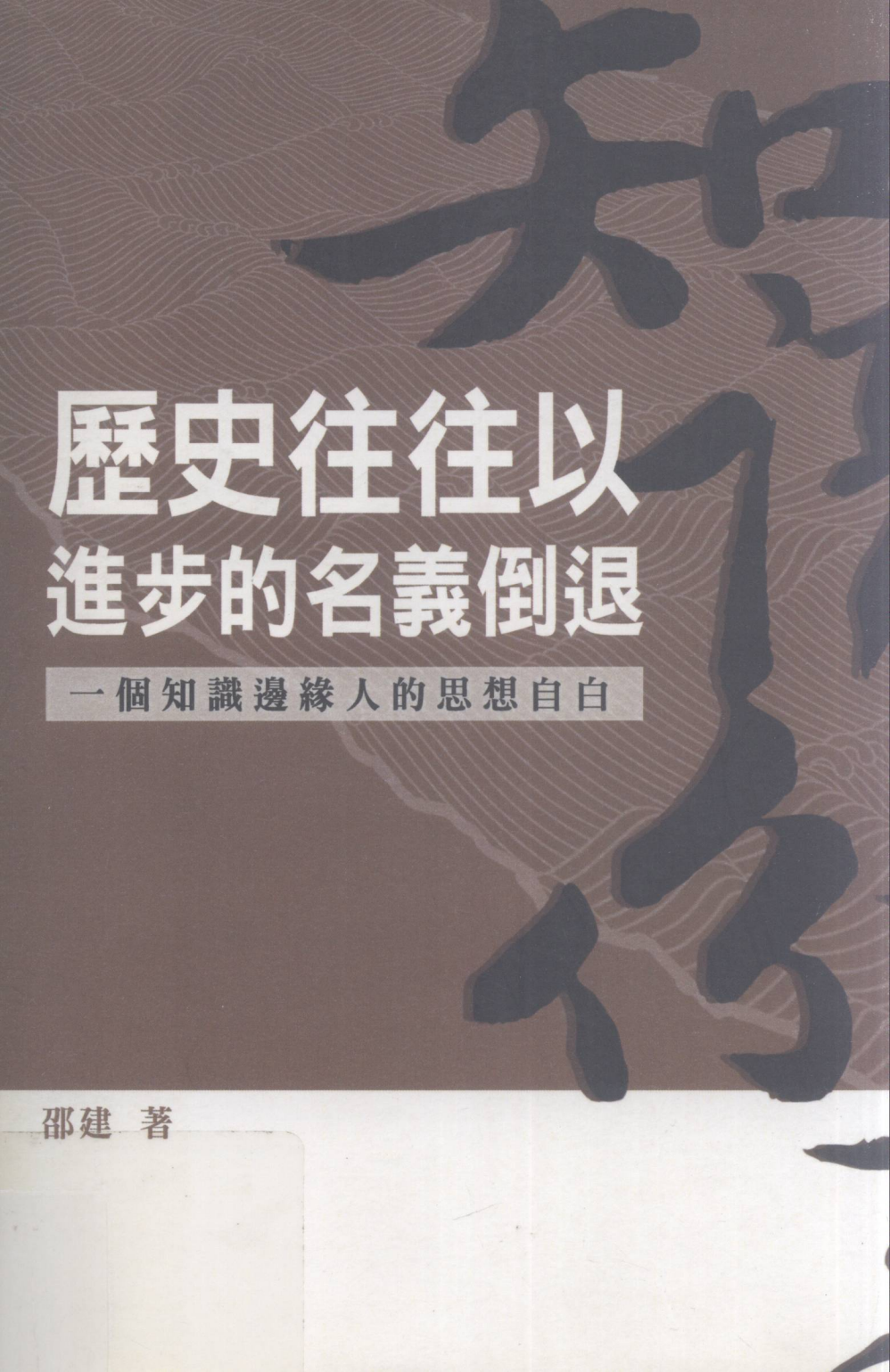




歷史往往以 進步的名義倒退

一個知識邊緣人的思想自白

邵建 著

C52
201054

歷史往往以 進步的名義倒退

一個知識邊緣人的思想自白



邵建 著

歷史往往以進步的名義倒退：一個知識邊緣人的思想自白 / 邵建作.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8.06
面；公分. -- (哲學宗教類；PA0023)
BOD 版

ISBN 978-986-221-035-2(平裝)

1. 言論集

078

97011351



哲學宗教類 PA0023

歷史往往以進步的名義倒退 —— 一個知識邊緣人的思想自白

作者 / 邵建

主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鄭維心

封面設計 / 莊芯媚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 年 6 月 BOD 一版

定價：40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目 次

■ 輯一	1
跪之懺悔、無辜負疚和我是同謀	3
基督會再次降臨？或，答案在風中飄	17
寬恕？寬恕！寬恕……——西蒙·威森塔爾的懸問	29
「普通的法西斯」	47
民族英雄武太郎	61
生命無辜，抑或死亡倫理	71
「意象形態」的時代	81
「意象形態」的挑戰	87
穿制服的時代與一具外來的身體	95
■ 輯二	103
自由的長旅	105
美國憲政文化二題	119
將違憲追究到底	125
無權者的權利和非政治的政治	135
「私」是一種權利	145
宏大敘事下的「個權」缺失	151
「權利」三個案	157
一篇小說、一張照片和一個問題	167

誰之亞洲？何種價值？	177
「旁白」一組	187

■ 輯三 197

「梟鳴」的貓頭鷹——知識份子肖像	199
所謂「知識份子」	207
「知識份子」讀札	217
知識份子工作	229
知識份子：現代中的反現代	237
「知識份子立場」	247
知識份子的公共責任及困境	255
走出法國式的知識份子世紀	263

■ 輯四 267

學術「價值」與政治「倫理」	269
學術非思想及思想泛學術	277
柏林的最重要的思想遺產	285
「怨道」的現代表達	291
「我」還是「們」——90年代知識界的一種文化症候	301
教育，從「教」字說起	309
真理不止一個和沒有對話的對話（二題）	317
從「一二·九一代」到「政治公民」（二題）	325
歷史往往以進步的名義倒退	331

輯一

- ◎ 跪之懺悔、無辜負疚和我是同謀
- ◎ 基督會再次降臨？或，答案在風中飄
- ◎ 寬恕？寬恕！寬恕……——西蒙·威森塔爾的懸問
- ◎ 「普通的法西斯」
- ◎ 民族英雄武大郎
- ◎ 生命無辜，抑或死亡倫理
- ◎ 「意象形態」的時代
- ◎ 「意象形態」的挑戰
- ◎ 穿制服的時代和一具外來的身體

跪之懺悔、無辜負疚和我是同謀

似乎得從這幅圖片說起。這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辦的一份刊物，《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該期第三十和三十一頁「百年中國」欄目的底圖是一幅攝影，它場面宏大，氣勢不凡，但落入人們眼簾的，居然是清一色的屁股。只見穿著各色褲子的屁股，從上到下，從左到右，一排又一排，遠遠近近，又密密麻麻。這些錯落有致的屁股動作整齊，朝天開放，不但密布整個畫面，而且由於是後視特寫，因而形成這樣的定格：只見屁股不見人。人呢？原來人頭的海拔統統在屁股以下。屁股和人頭似這般倒過來的「高開低走」，其姿態分明就是「跪」了。因此，不妨把這幅照片名為「百跪圖」——誰有興趣大略數一下，那些一律朝天的屁股足有幾百，並且攝影的取景只是局部，遺落在鏡頭之外的場面更是大有臀在。一幅由幾百隻屁股——況且還有更多只作為補充的畫面——自然對我的視覺形成了強烈的衝擊，甚至，我的眼睛離開它，它們依然在我眼前晃動。我在想，作者從何找到這樣奇崛的場面，那些屁股到底在幹什麼？

當然不是屁股在幹什麼，而是人在幹什麼。人在跪著，但跪並非問題的終結，人緣何而跪？答案可能很多，也可以說就一個，即「拜」。中國人下跪，大凡是為了拜，所以叫「跪拜」。至於所拜者何，那就因人而異了。此刻，可能是為了一個共同目的而集體跪拜，也可能是借助同一儀式卻各有所拜。但不管拜的是什麼，以跪的方式去獲取，肯定是令人不堪的——當然，有人不這麼以為。因此，對於跪，我在態度上向來不恭。俗諺「男兒

膝下有黃金」，跪不得也。更何況，像上述那種跪，不但屈膝，而且還把人的脊樑整個彎下去、彎下去，這分明是一種向動物回歸的姿態，實在有辱人的尊嚴。人所以為人，就因為它的脊樑是豎著的。豎著的脊樑乃靈長類中的唯一，是進化、還是造化，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一豎就把人與動物判為兩界。記得有國外一位學者論爭人與動物的區別，力反勞動說，認為動物如果不勞動，牠就存活不下去。因此，在勞動之外他自己另立了一個奇怪的標準，即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或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人能夠仰面朝天地睡覺（而動物卻絕對不能）。姑且不論這是否可以成為人與動物的根本不同，但如果僅僅作為一種現象劃分，它倒很別致甚至也很有趣地將人與動物分了開來。但，這位學者可知，人所以能仰面朝天地將自己放下來，首先是因為人的脊樑是豎著的，而動物所以不能像人這樣睡覺，也正因為它從來就沒有站直過。站起來與跪下去，這是身體的兩種姿態，但同時又蘊含著兩種不同的人格——人的和非人的。昔孟子有言「視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也」。此話到了今人嘴裏，那便是，你所以覺得某人偉大，那是因為你自己在跪著，因此，站起來吧！是的，站起來！面對眼前這幅不明所以的「百跪圖」，我在震驚的同時，也想作出這樣的斷喝。

然而，喝醒的卻是我自己，因為與此同時，我便意識到了自己的武斷和形而上學。我怎麼能如此將「站」與「跪」作這麼簡單的二元對立？雖然我族同胞善跪，甚至有著賈桂似的奴性，但跪的含義卻非僅限於賈桂一途，它未必不可能有著另外一種意義上的人的自覺。如果人是在對人性的某種體悟和反省上自覺地跪了下去，那麼，他跪下去時便是站著了。站的本義就是用豎著的脊樑支撐著人的思考。反之，他尚缺這顆思考的大腦時，他站著，尤其是被別人宣稱為站起來時，這種站不但是徒然的，並且未必不是跪的另一形式（主子叫賈桂站起來，與跪有什麼不

同)。當站與跪因其各自的內涵而僅僅成為一種形式表述時，我就不能再向其上那樣把它們解釋為兩種凝固的對立人格了。我必須這樣更正，正像有的站未必是人的一樣，而有的跪則可以是人的。因為我想起了勃蘭特。

還是在多年以前就讀過一則 70 年代的報導，我至今還能憶味當時的感動。那是 70 年代初，當時的西德總理勃蘭特造訪波蘭，當他在主人的陪同下前去憑弔二戰期間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的陵墓時，在幾百萬無辜的亡靈前，他實在控制不住自己，站立的身軀出人意料地跪了下去。他的舉止使整個在場的人，無論主賓，都吃驚不已，但又不知所措，因為這不是出於事前的安排。安排是有的，如獻花、默哀、鞠躬，但這都是禮儀性的，勃蘭特顯然超出了禮儀之外。他居然不顧自己的總理身份——此時的他一舉一動都代表著他的國家——卻在異國的領土上、也是在睽睽的眾目下突如其來地跪了下去。整個場面暴出窒息般的靜寂。沒有人過去攙扶，也許人們還未從驚訝中回過神來，當然首先回過神來的肯定是記者，優秀的職業感提醒他們這是千載難遇的鏡頭。於是，全世界都為勃蘭特下跪的鏡頭所動容。90 年代初，我是在看過報導的若干年後又無意碰上了一幅有關的照片，報紙上的照片當然是模糊不清，我看不清他的神情，儘管我很想看清。但我卻能記得那個場面的格局，勃蘭特跪之於前，一眾人立之於後。尤其讓我至今未忘的是，跪著的勃蘭特，他的脊樑是挺直的，也就是說，他是以人的形狀跪下去的，並且跪出了一種內深的人性。因此，這一跪反而使他作為人的形象高大起來。相信我，如果你有幸目睹那幅照片，你也會覺得那跪著的身形分明高大於身邊站著的所有的人。

我所以把這幾乎是頌讚性的筆墨對準勃蘭特，並非因為他是一國總理，而是因為他是一個人。我相信，他的下跪與總理無關，他與其是以總理的身份，毋寧是以人的身份。面對無數亡去

的冤魂，他很難不為自己的民族和同胞曾經有過的歷史而負疚，因此，他選擇了下跪，或者說，他無可選擇地以下跪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懺悔，跪的懺悔。我以為，這是人類下跪行為中最可貴的一份人文內涵。而我所以對之激賞，也許是出於我的某種誤解或偏見。我始終以為，和基督語境中的懺悔習慣相比，吾族吾民恰恰乏於這種屬於自贖的內省行為。因此，同樣是跪，國人更多是為了拜。但，出於功利而跪，和出於懺悔而跪，是大不一樣的。後者跪下去依然是個人，前者卻無論如何跪不出一個人樣。有「百跪圖」為證，儘管那上面有好幾百號人，而人卻成了屁股——人類永遠甩不掉的動物特徵。但願不至於有人認為我這樣說是「月亮都是外國的圓」，但僅僅在這個問題上，我不得不說，「月亮卻是外國的亮」（不同的生態環境所致）。不是嗎？在基督文化傳統中，人生來就是有罪的，因此，原罪使基督徒們需要不斷地向上帝懺悔。吾土不然，吾土的文化傳統中沒有宗教的成份，它對人性的體認非但不是罪的，而且是善的，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可以證諸。既為堯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麼懺悔，再說，又向誰懺悔呢？這裏我無意比較兩種文化的價值優劣，我只是想說，面對基督這樣一種異質文化，如果我們試圖有所鑒取的話，那麼，懺悔應該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宗。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人性中有著難以避免的惡。知惡而不悔惡，惡何如哉。然而，吾民的策略更多的是蔽惡。一個文革，多少人成了打手，可是，文革過後，人人又都成了受害。於是，從電腦中看到的一段文字電一般擊中了我，它說「當災難來臨時，只有跪下來順服的沒有站起來抗爭的；當一個災難過去後，只有站起來控訴的沒有跪下來懺悔的。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特點吧。」該站起來時，我們卻跪著，該跪下來時，我們卻站著——這肯定是我所見到的關於我們這個民族跪與站之錯舛最愷切的剖白。

然而，還有比這更可怕的。懺悔，如果視其為消彌人性之惡的某種解毒，或者是對人性的一種提醒。那麼，不懂懺悔，很有可能為惡而不知其惡，甚至，以惡為美，且目己為堯舜，也未可知。這並不是妄言。96 年以來，回顧文革 30 周年，當年的一些紅衛兵不是發出一種很強勁的聲音「青春無悔」嗎？這不僅是針對自己當年所受到的磨難，而且它也是用來解釋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於前者，我可以不聞不問，畢竟那只牽涉到他們自己。於後者，我就很難不問不聞，因為，他們當年的作為必然涉及那些無辜的受害，包括我。在那段由他們曾經參與的罪惡的歷史面前，他們不但沒有懺悔，卻這樣抗辯，「我要說，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動機其潛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的原因畢竟不是醜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在表現是愚昧、盲從、打架、兇暴，可是在他的內心是正義的烈火、友誼的信念、斯巴達克思的幽靈，是壯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是非居然可以這樣顛倒，「愚昧、盲從、打架、兇暴」居然可以這樣奇蹟般的化惡為美。那麼，我相信，即使是衝鋒隊的屠戮，恐怕也不難於找到類似的理由了。面對這段文字我無法不想到老舍、儲安平以及許許多多知識份子被紅衛兵毆鬥毒打的場面，同時也無法不想到少年時切身經歷紅衛兵抄家時的野蠻情景。我只能說，如果他們當年的作為是美的，那麼就是我們活該；如果我們當年是受害，那麼他們今天至少應該表示起碼的懺悔——這是人性的底線了。然而，那自聖般的堂皇修辭啊！似乎受害人當年承受苦難，今天還得向他們反躬致敬。也許在某種意義上，惡不是不可以容忍的，但難以下嚥的是用美來包裝惡，就像我本人未必不可以容忍妓女，但卻受不了她把自己說成是「獻身」。

這是一種比較，一個紅衛兵作出了有違人性的事，並造成了相應的後果，但他卻訴諸自己那美好的動機，於是他就不必為他所作的一切（包括後果）負責，因為動機可以證明他無辜。但那個勃蘭特呢？是他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屠殺嗎？或者，他有過這樣的動機？沒有，都沒有。可是，他卻下跪了。兩相比較，明明與紅衛兵有關的，但經過一番修辭轉換，有關變成了無關；明明與勃蘭特無關的，經由他這麼一跪，無關卻變成了有關。那麼，到底是有關還是無關？我揣度著勃蘭特的內心，想起了吾土的一則典故，「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也許，恕我寡陋，這是懺悔意識匱乏的文化傳統中極為罕見的懺悔閃光了，儘管只那麼一下。但我很想用它與當今的老紅衛兵們共勉，而且更想將這一漢語辭條贈與那個基督徒（？）勃蘭特，它與他是多麼地吻合。同時我還禁不住為我們祖先偶然達到的這樣高度自責的懺悔境界（甚至包括它的表述）而感動。然而當我不放心地去翻書，看看自己的記憶是否有誤時，我失望了。它不像我想像的那樣閃光，同樣，也並不那麼適合勃蘭特。典故的主人公是晉時的王導，王導的堂兄謀反時以舊怨殺了王導的朋友伯仁。殺前他曾將此打算告之王導，但王導卻曖昧地不作表態。事後，王導得知伯仁曾在朝廷上多次為自己辯護時，良知感撼，痛哭流涕之下，故出上言。顯然，我的失望是，如果沒有伯仁辯護於前，王導能否有愧於心其後？答案看樣子是否定的，否則當初就該援之以手。在嚴格的意義上，伯仁之死，王導非但無辜，而且還是同謀。但王導是，勃蘭特卻不是。他既沒有參與屠殺猶太人，猶太人亦非由他而死。相反，二戰期間他本人還是反納粹的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在任何意義上，勃蘭特都與那場大屠殺無關，他不必有任何意義上的自譴。可是，正如世人所見，他下跪了，跪成一個特寫，那筆直的身軀和低垂的頭不妨是示給我們的問號：勃蘭特為什麼下跪？無辜負疚。當我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未能圓滿地解釋

這個問題時（恕我無能），依然是基督文化給了我啟示，似乎它能夠使我有效地破譯出這舉世一跪之後更內深的人性密碼。慚愧的是，我對「無辜負疚」並不熟悉，比如我不知道它是否有一個相應的典故，而這個典故是否深藏在《舊約》或者《新約》某個紙頁發黃的地方。我只是三年前在報紙上的一篇短文中匆匆地接觸過它，但這四個字定格一樣讓我難忘，以至在這篇文章的寫作中，不期然而然就躍上了我的鍵盤。那麼，什麼是無辜負疚呢？既然我不能找出書證，不妨就發表自己的理解。在這之前，我想引用劉小楓博士一本書中的一位天主教徒的懺悔，她說「負疚是個人對自己生命的欠缺的道德承負。負疚出於如果我當初……，那麼就……的假設心願，一種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跡的願望。如果不是因為一個人心中有與自己實際有過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想像，就不會有這樣的心願，也就不會有負疚。」顯然，這裏說的負疚還不是無辜負疚。事實上，說這話的主人公曾因膽怯而未能救助一個有可能受到納粹迫害的小女孩，此後她便固執地認為是自己使一個生命受過傷。儘管那個女孩最後並未落入納粹之手，但，她在她那近乎嚴苛的理解中，那個受傷的生命與自己有關。無辜負疚不然，它的直接前提卻是與己無關。把無關的變成有關，乃是自延其「罪」，它所蘊含的哲學毋寧是，在人類生存的終極層面上，個人並不是個人，而是人類。正如榮格所說「我們已不再是個人，而是全體，整個人類的聲音在我們心中迴響」。因此，他人受難，我亦有份，他人有罪，我亦擔當。在這裏，他不僅是他，而且是我的又一個生命。詩人西川曾有一短文，命題為「個我、他我、一切我」，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過我對這種個人中心主義——這是知識份子通常有的毛病——的異議，但在此刻的語境中，我很願意反向援引這個受啟於《草葉集》中惠特曼思想的句子。個我從來就不是單純的，他我是個我的疊加，因此，在最寬泛的人道意義上，每一個個我應該自覺有一種「一切我」

的擔待（而非支配「一切我」的權力）。惠特曼說「我包容一切」，邏輯上也就包容他人的罪過（但卻不要去包容他人的功績），這樣，有誰還能說他所發生的一切與我無關呢。直接層面上的無關，轉至人類自省的內深層面上卻是有關。在有關與無關之間，準確的說法則是人類在其生存上的「息息相關」。正是出於人類在自己生活中的這種相關性，所以，中國的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酒臨風，憂天下之憂而憂，而在基督語境中，這種人文風骨似乎更有所延進，罪天下之罪而自罪。

我以基督文化中的無辜負疚以及我對它的理解來詮釋勃蘭特的跪，到此應該收筆了，否則我自己就以為涉嫌成了這位前西德總理的頌讚，而這是讓我十分難堪的，它有違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執筆原則。一個站在體制之外以批判為務的知識份子寧可把讚辭獻給女性，也不會留給官員，儘管正如我說過，我是把勃蘭特作為一個人來剖析，他的下跪，與總理無干。然而，現在，我依然需要走出這個「彼得堡」，因為，就無辜負疚這一體現了人性某種品質的基督精神而言，勃蘭特是個案但不是孤例。這裏，我很想敘述一下前俄國的猶太裔哲學家弗蘭克，一位真正的知識份子，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後來成了東正教的傳播者。從他的身上可以使人感知無辜負疚精神的另一側面。同時，我覺得，弗蘭克早年的經歷和中國的紅衛兵理想主義者們比較接近，因而在性質上兩者更容易構成比較——如何面對自己早年的理想與激情。同時在我的潛意識裏，也暗暗地希望中國的紅衛兵們能夠從這位同路人的身上獲致某種反思，當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這是劉小楓博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新精神哲學」系列中的一本書——《俄國知識人與精神偶像》，弗蘭克正是在這個由中國人彙編的集子中對他早年所信奉的各種精神偶像作出了深入的批判，其批判本身已使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感佩的是他的批判鋒芒竟直指自己，他把真誠的自我批判融入他的懺悔，這種別具弗式色彩

的批判性懺悔便使無辜負疚在走向人性之深的同時又泛出極為可貴的思想亮色。

「二十五年前，在俄國青年的一定圈子裏充滿對獻身革命的普遍崇拜。青年大學生無一例外地分為兩組：或者是無原則的追求名利地位者和酒鬼——『貴族闊少爺』，或者是獻身於進步和拯救人民的『有理想的人』，也就是革命英雄。」弗蘭克屬於哪一組呢？不言而喻。但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弗蘭克。「在莫斯科的這樣一個『無辜』的大學生『革命』小組裏，有一個俄化的德裔貴族出身的青年，性情溫和，沉默寡言，很有教養。當小組被捕以後，……這位青年卻出乎大家的意料，在監獄裏自殺了，而且是用極其殘忍的方式，以證明極度的精神失望：先是吞食了大量碎玻璃，然後往自己床上灑了煤油點火自焚。」臨死之前，這位青年承認「使他痛苦的是自己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者，自己對這一事業的內在反感，對普通的平靜生活的不可克服的願望。」饒是如此，但當時正處於革命狂熱狀態中的弗蘭克還是忽略了這個青年自殺的真正原因，並將其諉諸敵人。他說「他的死使我們震驚，但是我們把罪過歸於可恨的『君主專制』制度；我們照例在他的葬禮之後舉行了反政府的遊行，使我們的革命美德意識得以安慰。」事情本來可以到此結束，事實上也結束了，弗蘭克後來也脫離了革命，並被蘇維埃驅逐出了俄羅斯，從此便浪跡國外，以至終老。可是若干年以後，弗蘭克「回想起此事」，這時才「感到自己對這個無辜的犧牲負有責任」。他這樣懺悔「我感到自己是那些為了革命而在特殊狀態下發生的殺人和惡行的道義上的同夥。因為正是我們這些理想的犧牲者，用自己追求革命的思想榜樣和革命英雄主義的道德強迫，宣判了這個無辜的年輕靈魂的死刑；我們強行給他加上了他所不情願的獻身革命的無情苛求，儘管我們沒有發現這一點。」弗蘭克當時沒有發現，可是後來發現了，就像那個自殺的青年是無辜的，其實弗蘭克也是無辜

的，但他卻作出了負疚的反省——此可謂俄文版的「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但它毫無王導式的個人利害關係在內。相形之下，中國的紅衛兵對其受害應該是負有一定責任的，正如弗蘭克對那個青年並沒有責任一樣；遺憾的是，他們卻什麼也沒有發現。當時沒有發現，爾後也沒有發現，甚至直到今天。如果說普通的人性比高貴的理想更重要，那麼，到底是什麼遮蔽了他們本應發現並且也不難於發現的雙眼？

在無數猶太人的亡靈前，勃蘭特長跪無言；而面對一個人的死亡，弗蘭克卻自懺如劍。兩人一個用行動，一個用語言，從不同的側面給無辜負疚注入了沉重的人道內涵。但，僅此而已嗎？所謂「逝者長已矣」，可是活著的人還要繼續活下去，而非「存者且偷生」。那麼，如何活？如何才能不偷生？這是個問題。負疚是「一種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跡的願望」，懺悔既是告慰亡去的靈魂，也是自新人類生命的禱告。因為他人的死，已使人類的生存亦即我的生存產生了病變。當南美原始森林中的蝴蝶煽動一下翅膀，非洲大陸的草原上便降下一場漫天大雨，大自然尚有此不可思議的「蝴蝶效應」，況乎地球在「村化」中原本就息息相關的人呢？此前，對無辜負疚的理解更多是落實在人道的或道德的層次上，看來是不很夠的，在這個層次上，它僅僅是一個有關人類「良知」的問題。可是，它為什麼不同時也是有關人類自身「生存」的問題呢？在生存論的層次上，懺悔的意義可以重估，它未必不意味著生者對自己所面臨的生活的一種責任。因為幾百萬猶太人的鮮血並未滌盡人世間普遍的惡，奧斯維辛之後，還有古拉格、文革、波爾布特、太陽王朝……，血流成河的世紀啊，歷史沒有終結。人類的每一次被屠戮，都是我自己的死亡。當死亡的陰影依然在眼前晃動的時候，懺悔就不僅僅是自責，它也是人類一種發自本能的惕惕然的自警。1936年，帶有法西斯性質的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分明寫過《永別了，武器》以示自己反戰立